

楚辞与文化交流

郁龙余

一、楚辞中的外来文化影响

沈括在其学术巨著《梦溪笔谈》中这样写道：“《楚辞·招魂》尾句皆曰些(苏个反)，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，凡禁咒句尾皆称些。些乃楚人旧俗，即梵语‘萨诃’也。(萨音桑葛反，无可反，诃从去声。)三字合言之，即‘些’字也。”^①

至近代，不少人指出《楚辞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。例如，屈原的出身时间，《离骚》中说：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我以降。”有学者提出“摄提”是外来语。科学史专家钱宝琮注意到《尔雅》正月名陬，《史记》作聚，或作陬(‘历书’云孟陬殄灭)。其他岁阳、岁名亦多同音异字，似属译自他国语言。”^②天文学家竺可桢更是果断：“摄提格、单阏等名辞之为译音，无可讳言。”^③科学史家吕子方认为：“摄提就是太岁、太阳、岁阴。……屈原这句话是说太岁在某处之年正月。他将摄提格三字省略成摄提二字。”^④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科学家们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。然而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认为“摄提格乃梵文岁星(Vrishaspati)之译音”，有的认为“摄提格为巴比伦拉底语岁星(Dibbat Gottao)之华名”，有的则认为是“巴比伦十二宫中双鱼宫(Shepat)华译。”^⑤岑仲勉则认为摄提是印度梵文北斗(Saptakah)之音写。^⑥不管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，他们互相之间的意见有多么不同，甚至相互矛盾，“但这种多音节的语音毫无疑问的，可知是外来之语。”^⑦

苏雪林是一位极端派，她写的大量论著中，坚决主张屈原及其作品受到了域外的巨大影响。她说：“《天问》这篇大文是‘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’，不但天文、地理、神话来自域外，即历史和乱辞也膺有不少域外文化分子。”^⑧她在1944年曾著《〈天问〉里的印度诸天搅海故事》一文，认为《天问》中“白 嬰，胡为此堂？安得夫良药，不能固藏？天式从横，阳离爰死，大鸟何鸣，夫焉丧厥体”叙述的是印度古代诸天搅乳海的神话故事。并认为《天问》中三个不死之药的故事，均与印度有关^⑨。她甚至认为邹衍是位“外国学者”，来华授学并形成学派，对屈原及作品不无影响。对这个问题，香港饶宗颐比较谨慎，他说：“屈原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，有无取自域外，这是极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。”^⑩

中国和印度都有月兔的故事。台湾糜文开经过多年研究，认为月兔故事原生中国，是

由早期佛教徒带回印度去的。他说月兔故事“是我唯一所能举的中国文学影响印度文学之例。”^⑪然而此说有误,主要原因是他断定公元3世纪以前,印度没有月兔故事,而中国月兔故事自西晋开始流传。其实,《天问》中就有月兔记载,“厥利惟何,而顾兔在腹?”就是说在战国时月亮中就有一只兔子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非衣上,有钩弯月,月亮上有蟾蜍,有兔子,蟾蜍在下,兔子在上。中国月兔故事的时间虽然提前了,但它仍然不是土产。季羨林认为:“它来自印度。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《梨俱吠陀》(Rigveda)起,印度人就相信,月亮里有兔子。梵文的词汇就可以透露其中的消息。许多意思是月亮的梵文字都有 *sasaa* (兔子) 这个字作组成部分,譬如 *sasa dhara* 和 *sasa bhrt*, 意思是带着兔子的: *sasalaksana*, *sasal ksmana* 和 *sasalaksman*, 意思都是‘有兔子的影像的’。”^⑫

上述材料,综合起来完全可以向我们表明:楚辞中确实存在着外来文化的影响。

二、楚辞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

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,楚辞中存在外来文化的影响,是顺理成章、毫无疑问的事。文化交流,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动力。“人类文化的发展与文化交流密不可分,没有各种不同文化的互相交流、融合、创新,文化的进步发展无从谈起。”^⑬人类文化发达的程度与文化交流的范围成正比:文化愈原始,交流的范围愈小;文化愈进步,交流的范围愈大。旧石器时代,人类无法征服雪山、沙漠、海洋等险阻,只能在以这些险阻为天然界限的单元地域里辗转。发展到新石器时代,人类能突破单元地域的界限,海上也有了短距离的航行。青铜器时代,陆上文化交流更为频繁,海上航行的距离得到充分延长。铁器时代,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大大加强^⑭,东西方之间出现了著名的长距离商路。

以下几大事件,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

印第安人的祖先“在一万五千到二万五千年前从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入了美洲”,“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带,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带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。”^⑮

由于日本海存在环流,所以“早在远古时代,日本同朝鲜之间,不但显然有了航路,往来相当频繁,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源源经由这些航路传到日本。”^⑯

西汉张骞凿空西域,遂有著名丝绸之路。其实在丝路之前,东西方之间早就出现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草原商路,东西方之间的铜器、陶器、药材、毛皮、漆器等物品,通过这条商路进行交流。因为斯基泰人在这条商路上起到重要作用,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“斯基泰商道。”

张骞出使大夏时,见到邛竹杖和蜀布,并知道这些物品来自身毒(印度)。由此可知,“在他出使之前,从中国西南经缅甸而通往印度的道路是早已存在的。”^⑰到底早到什么时代?按人类文化交流的发展的进程推算,像中缅印通道这样的自然环境,人类完全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所沟通了。

文字的出现,使得人类历史有了可靠的记载。但是,后人由于过分依赖文字,反而又让文字像一把刀一样切断了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,使得这段漫长历史变得模糊不清。然而,我们通过岩画、石刻、纹饰、墓葬等等的研究,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文字的不足。如《中西纹饰比较》一书“为公元前一千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西交通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,展示

了这一时期内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大形势,从而显露了古代文字资料所没有——或者说模糊而歪曲——记载的上古时代域外交通的部分真相。同时,也着重暗示了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:古代中国的某些文化现象,既非纯粹的‘土生土长’,亦非完全地从域外输入,而可能是经过反复的双向、多向交流与融合后才得以形成;并且,这种形成过程的进行,远在现代人通常认可的时间之前。”^⑧

楚辞形成于中国战国时代。春秋战国,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。《楚辞》是一部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典籍,如果其中丝毫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,是难以想象的。

三、楚辞研究需要开阔文化视野

楚国北连中原,西接巴蜀,东邻吴越,南近粤海,万里长江横贯其间。从自然地理上说,其开放态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,为人员、货物和文化的交流大开方便之门。

楚文化相对于北方诸夏文化发展较晚,但楚人不甘落后,后来居上,春秋战国时代是其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。在这一时期,楚人充分表现出海纳百川的气概,为楚文化增添了众多文化交流融合的特色。如楚陶是夷夏相变的成果,楚人青铜冶炼技术得益扬越和中原,独具风格的楚制、楚俗介乎华夏之间。“对待先进事物,楚人向来不抱偏见,趋之唯恐不及,求之唯恐不得。”^⑨对于这样具有博大胸怀和文化开放性格的楚人,将外来文化的某些成份吸纳到自己的文化中来,已成习惯。吸纳的这种外来文化,不仅包括域内兄弟民族的文化,而且包括域外异邦的文化。考古发现给了我们有力的证据。公元前4世纪的楚墓中曾发现了产于印度的蚀花琉璃珠。有人认为“印、楚间文化交流,至晚当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。”^⑩

屈原是楚人的骄傲。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政治情怀,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,又曾出使齐国,在他的著作中出现若干外来文化的影响,是其开放文化性格的生动例证。

问题是,我们有些研究楚辞的学者对这一点往往采取消极的立场。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,许多是科学家,而不是楚辞专家。在楚辞专家中,苏雪林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。她的《屈赋新探》坚决主张楚辞受到外来文化影响。但是她是孤立的,她的研究成果遭到了抵制,她的许多论述被认为是“杂乱不堪”,是“极大误解”。对于苏先生的论述,笔者也不能全部同意,并认为是受到了中国文化西来论的影响。但是,我赞赏她的基本论点——楚辞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,并钦佩她的学术勇气。对她完全否定,缺乏学术公正,是中国文化西来论的另一种消极影响。

近年以来,学者们运用考古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、神话学等众多研究手段,使楚辞研究获得许多新突破。我以为还应加上文化传播学,开阔我们的文化视野。这样一定有助于楚辞研究的进程。上个世纪英国人史密斯成功破译古巴比伦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中的一个插话大洪水的故事,极大推动了《圣经》的研究。现在,完全否认楚辞存在外来文化影响的学者,大概没有了。我们现在需要采取积极、主动的态度,把这种影响进行认真梳理和科学分析。像古巴比伦的大洪水故事不会影响《圣经》的地位一样,研究清楚了外来文化对楚辞的影响,也决不会损害《楚辞》的地位。我们不但要把《楚辞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加以研究,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有价值的典籍

来加以研究。因为在中国早期典籍中,像《楚辞》这样蕴藏着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信息之书,是不多见的。这种研究一旦有所突破,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,那么《楚辞》就将闪耀出更加明丽的光芒。

(作者:郁龙余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 518060)

[责任编辑 马斗全]

-
- ① 沈括《元刊梦溪笔谈》(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)第三卷 2 页。“萨 词”即梵语 svaha。
 - ② 钱宝琮《中国东汉以前时月日纪法之研究》(引自《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》,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,第 117 页)。
 - ③ ⑤ 竺可桢《竺可桢文集》(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)第 239 页。
 - ④ 吕子方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)第 191 页。
 - ⑥ 岑仲勉《两周文史论丛》(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)第 240 版。
 - ⑦ [日]白川静《中国神话》王孝廉译本(台北长安出版社 1983 年版)第 158 版。
 - ⑧ 苏雪林《天问正简——屈赋新探之二》(台北广东出版社 1974 年版)第 7 页。
 - ⑨ 见郁龙余编《中印文学关系源流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)第 69 页。
 - ⑩ 《饶宗颐史学论著选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)第 119 页。
 - ⑪ 同⑨,第 268 页。
 - ⑫ 季羨林《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)第 100 页。
 - ⑬ 郁龙余《中西文化异同论·前言》(三联书店 1989 年版)第 7 页。
 - ⑭ 郁龙余《略论文化交流》(《深圳大学学报》1987 年第 3 期)第 49 页。
 - ⑮ 贾兰坡《谁先到了美洲·序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)第 2 页。
 - ⑯ [日]木宫泰彦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(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)第 1 页。
 - ⑰ 黄时鉴《中西关系史年表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)。第 40 页。
 - ⑱ 芮传明、余太山《中西纹饰比较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)第 32 页。
 - ⑲ 张正明《楚文化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)59 页。
 - ⑳ 参见邓廷良《丝路文化·西南卷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)第 175 页。